

走
进
经
典

在社会主义入口处

——重读列宁《国家与革命》

何萍 著



人民出版社

在社会主义入口处

——重读列宁《国家与革命》

何萍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邓仁娥

封面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汪 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社会主义入口处：重读列宁《国家与革命》/何萍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6

ISBN 978-7-01-011974-8

I. ①在… II. ①何… III. ①列宁著作—单行本—1917 ②《国家与革命》—研究 IV. ①A225 ②A8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8507 号

在社会主义入口处

ZAI SHEHUI ZHUYI RUKOUCHU

——重读列宁《国家与革命》

何 萍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5.625

字数：95 千字

ISBN 978-7-01-011974-8 定价：1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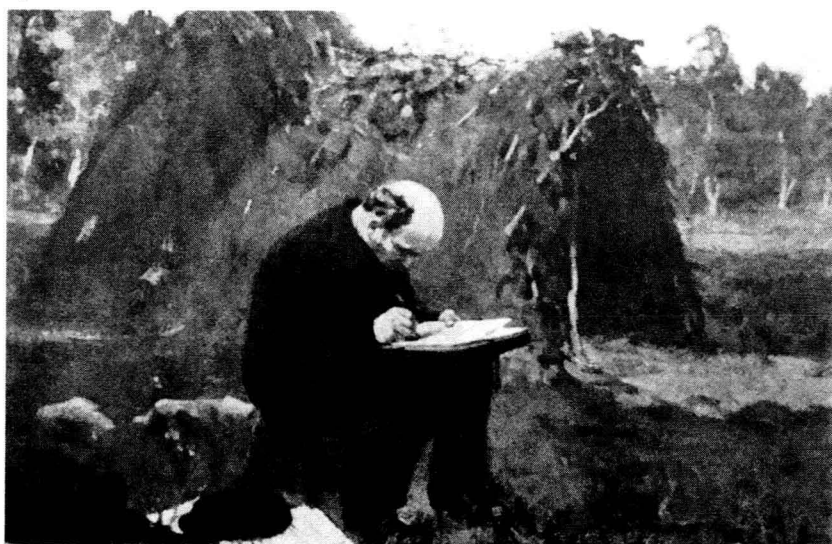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引 言

未写完的书与未竟的事业



30年前，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中国人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之一，也是中国大学的马克思主

列宁在拉兹里夫湖畔的草棚里写作《国家与革命》

义教育的必读书之一。然而，30年后的今天，这本书，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变得十分陌生了。那些曾经读过这本书，或研究过这本书的人，早已把它封存在自己的记忆中，而那些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人几乎不知晓这本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说起今天要重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那么，无论是知晓的人，还是不知晓的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国家与革命》对我们今天的时代还有意义吗？这本书还能够成为中国社会改革的思想资源吗？在当今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中，究竟还有多少人在读这本书？他们是如何阅读的？如果不先解答这些问题，人们是不会拾

位于涅瓦河左岸的冬宫、旧海军部、海军部大厦。这里是俄国1905年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发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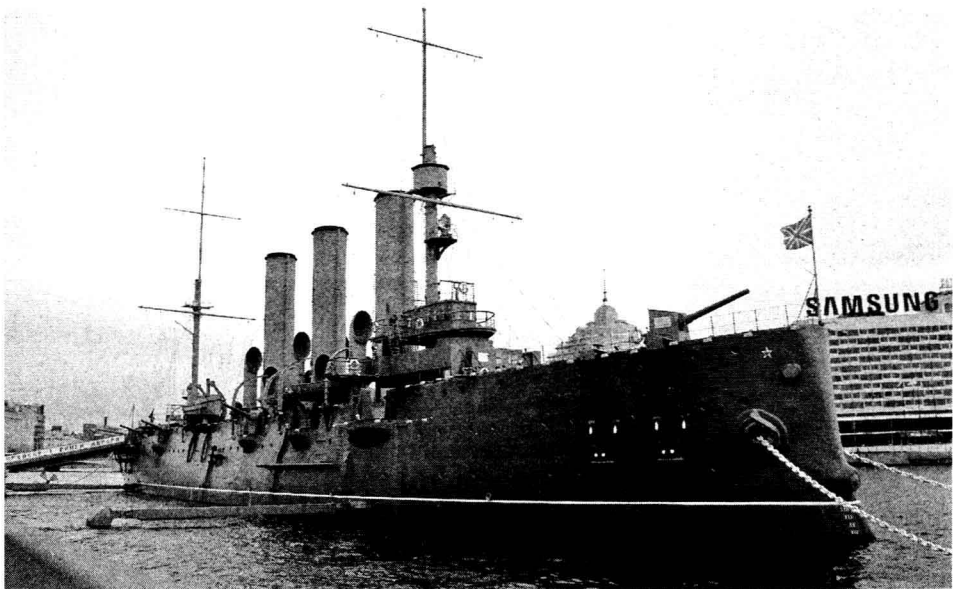
起这本书的，当然也不会有兴趣来读这本书。

其实，要解答这些问题，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这就是，了解这本书的“不足”和这本书的“续篇”。

这本书的最大“不足”就在于，它是一本未完成的书。对于这本书未完成的原因，列宁在1917年11月30日为该书出单行本写的《第一版跋》中作过这样的说明：“这本小册子是在1917年8、9月间写成的。我当时已经拟定了下一章即第7章《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的提纲。但这一章除了题目以外，我连一行字也没有来得及写，因为1917年十月革命前夜的政治危机‘妨碍’了我。对于这种‘妨碍’，只有高兴。但是本书第2册（《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看来只好长时间拖下去了；做出‘革命的经验’是会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的。”（《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1页。以下至第一章同此卷引文，只注页码。）

列宁这里所说的“1917年十月革命前夜的政治危机”，指的是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政治形势。1917年8月，俄国的反革命将军科尔尼洛夫联合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阴谋发动反革命暴动，疯狂地镇压革命，取缔在1917年2月革命中建立起来的“工兵苏维埃”。为了粉碎这场反革命暴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工人和士

兵对反革命势力进行了武装抵抗，并且取得了胜利。这场胜利创造了十月革命的客观形势，但是在发动十月革命的主观方面，布尔什维克党还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首先，在布尔什维克党外，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资产阶级政党和妥协党都反对把国家政权转到布尔什维克党的手中，他们断言：“布尔什维克永远不敢单独夺取全部国家政权，或者即使敢于夺取并且夺到了政权，也不能保持这个政权，连一个极短暂的时期也保持不住。”（第 282 页）对此，布尔什维克党必须给予理论上的回击。其次，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在对革命的客观形势的估计上、在组织武装起义的决心和思想路线等问题上，还缺乏统一的、成熟的认识。当时，“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已经提上了日程，尽管如此，党内还是有一些人，如中央委员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条件还不成熟，不同意立即发动武装起义，主张先成立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这些都极大地妨碍了布尔什维克党组织武装起义。面对这种形势，列宁不得不中断《国家与革命》的写作，集中精力去指导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和斗争。10 月初，列宁从芬兰秘密回到彼得堡，亲自领导十月革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再也没有时间返回到这本书的写作上来。这就使《1905 年和 1917 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一章成了永久



的缺篇,《国家与革命》也由此而成为了一本未写完的书。

列宁在写作《国家与革命》一书的提纲和纲要时,特别重视第7章。在写第1个提纲时,列宁就将该章明确地列入了写作计划;在写补充提纲时,他还考虑增加第7章的写作内容。他写道:“是否要增加一章(或是在第7章中增加几节):用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把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具体化?这是必要的!发挥第7章”¹,同时,他还为第7章写了两个详细的提纲,其中,单是“1917年俄国革命”就写了两节提纲;在《国家与革命》的结尾处,列宁还就第7章

“阿芙乐尔”号巡洋舰。1917年11月7日,这艘军舰按照命令信号,向冬宫发射了第一炮,拉开了伟大的十月革命的序幕。

的内容写下这样一段话：“这一章的题目非常大，可以而且应当写几卷书来论述它。这本小册子自然就只能涉及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在对待国家政权方面的任务直接有关的最主要的经验教训了。”（第220页）这些足以表明，在列宁的写作计划中，第7章是《国家与革命》内容的重中之重，是最应该写完的一章。然而，历史却没有留出足够的时间让列宁去完成这一章。对此，列宁并没有感到丝毫的遗憾，反而倍感愉快和欣慰，因为他认为，自己在这一年“做出”了比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1918年3月12日，苏维埃政府迁到莫斯科，列宁就在这里办公。



他论述 1905 年和 1917 年俄国革命经验更有意义、更有震撼力的事情，这就是领导了伟大的十月革命。本来，他论述 1905 年和 1917 年的革命经验就是为这场革命作理论准备，就是为了“做出”十月革命的经验。现在，这场革命已经实现了，理论要解决的问题已经在实践中解决了，还有什么会比这更令人感到愉悦的呢？况且，与 1905 年和 1917 年的革命相比，十月革命毕竟是无产阶级政党独立发动和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世界上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其意义和影响已经远远地超过了 1905 年和 1917 年的革命。因此，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论述 1905 年和 1917 年的革命经验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更重要的事情是要总结十月革命的经验，因为这个总结无论是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还是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展来说，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建立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打下了现实的基础，但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布尔什维克党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是要用革命、用武装斗争的形式战胜国外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的反革命叛乱，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其次是要组织生产，进行有成效的社会管理；再次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最后还要领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这些都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也是十月革

命这个伟大事业的一部分。因此，为了保卫十月革命的成果，把十月革命的事业进行下去，列宁总结了十月革命的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进行了新的探索。

1918年5月，列宁写了《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提出要善于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列宁指出，这是由俄国的具体特点决定的：“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制度方面，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不管什么英国或德国都要先进，但在组织像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明程度方面，在从物质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第531页）由于这一特点，俄国“要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全力仿效这种国家资本主义，要不惜采用独裁的方法加紧仿效”（第526页），要运用国家资本主义使俄国的经济迅速走上社会化管理的道路。在这里，列宁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一种是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国家统治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一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列宁强调，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应该运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来组织和管理生产，提高管理的社会化程度，以便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形式。这无疑是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切合实际的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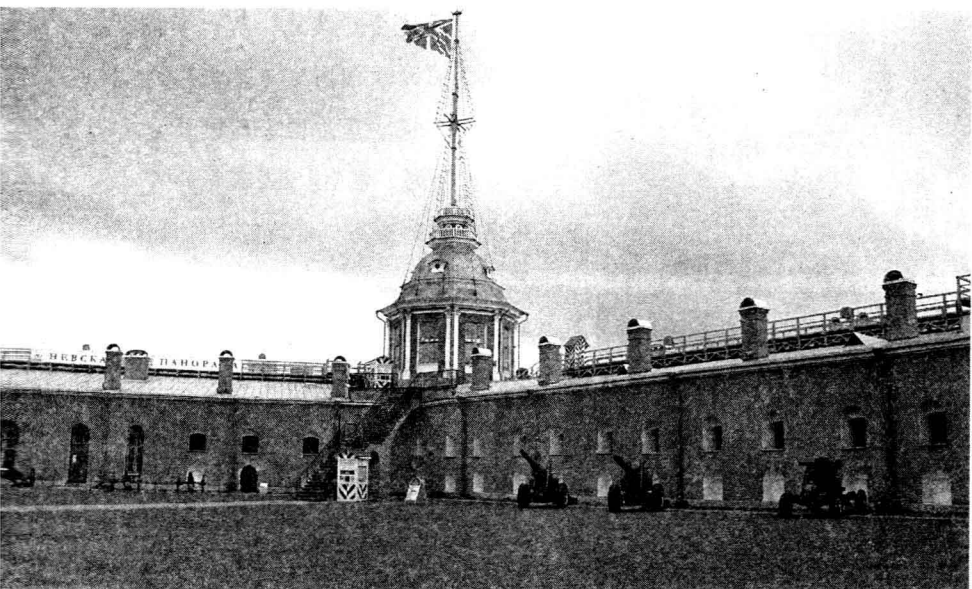
想，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1918年11月，列宁写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在这本书中，列宁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专政与民主的辩证关系。在列宁看来，专政和民主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它们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并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为前提的。巴黎公社是这样的国家类型，苏维埃也是这样的国家类型。在这样的国家中，民主的最高形式是吸引被剥削的群众参加管理，为了保障这种民主，就需要专政，需要以专政的手段剥夺剥削者的民主，这就是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社会主义的民主只能通过专政来保障，在这里，抽象地谈论民主和平等是不切实际的。这一论述使《国家与革命》中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更加具体化了，也更加明确了。

1920年4—5月，列宁写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在这本书中，列宁提出了将十月革命经验国际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列宁看来，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在很长的时期内依然比资产阶级弱，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有着十分广泛的国际联系，还因为俄国是一个小商品生产的国家，小商品生产者自发地、经常地使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复活和再生，因此，俄国无产阶级要战胜资本主义，就要使

十月革命的经验国际化，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国际联盟。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十月革命的经验是否具有国际意义？如果有，那么它的国际意义指的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列宁的回答是：十月革命的经验毫无疑问地具有国际意义，但这不是指十月革命的一切特点，包括那些俄国独有的具体的、次要的特点，都具有国际意义，而是指十月革命事件本身在国际上具有重要性或历史必然性，指十月革命中的一些基本特点具有国际意义。那么，十月革命中的哪些基本特点具有国际意义呢？列宁认为，是那些使布尔什维克获得成功的基本条件，这些基本条件最重要的有两点：一点是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另一点是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中和在革命胜利后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的领导权。在这两点中，前者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形式，即民主集中制，后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和国家理论。不仅如此，列宁还把这两个基本特点作为第三国际的基本原则，在实践上推动了十月革命经验的国际化，使全世界都变了样。

1920年底，苏维埃国家战胜了英法日波的武装干涉和国内资产阶级地主的反革命叛乱，开始了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在这个时期，列宁写了《论粮食税》、《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关于



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务》、《论“双重”领导和法制》、《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论著，从理论上分析了新经济政策的经济内容和政治内容，探讨了在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如何根除官僚主义制度，建立新型的民主制度等问题，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对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国家问题所作的这一系列的探讨，构成了《国家与革命》的

彼得堡要塞初建时是沙皇时期的国家监狱，它记载了俄罗斯的军事史、革命史和国家史。图为彼得堡要塞棱堡，是要塞的军事设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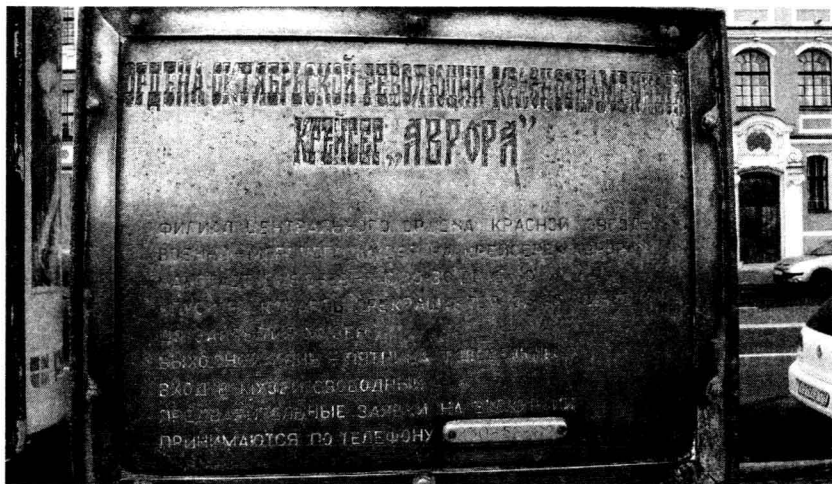
化装后的列宁。1917年7月，列宁化名工人依万诺夫，用这张身份证从事秘密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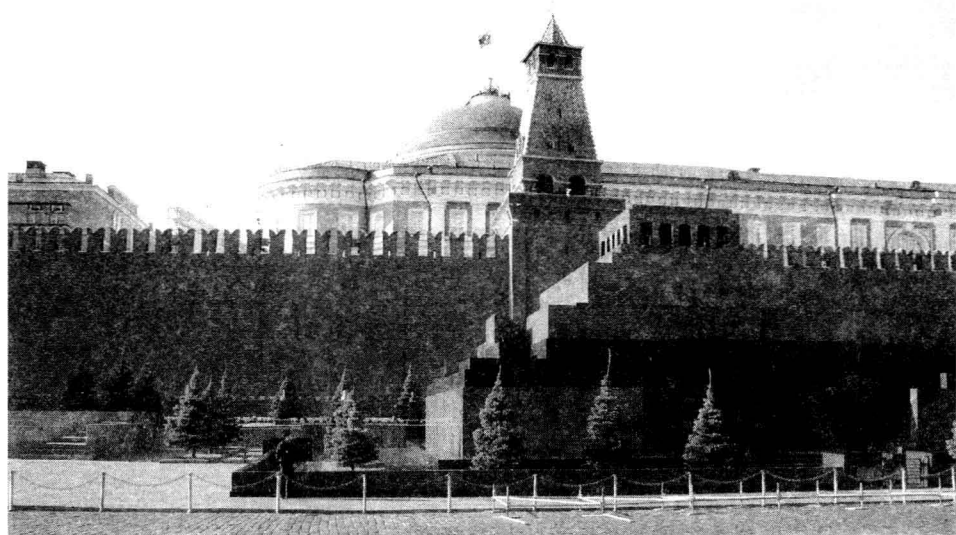
“续篇”。这个“续篇”从一个新的视角揭示了《国家与革命》的主题——探索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把这一道路概括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的革命时代；第二个阶段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第三个阶段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第四个阶段是共产主义社会。其中，前两个阶段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在分析这两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时，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对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些论述构成了《国家与革命》的革命方面的内容；后两个阶段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列宁在分析这两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时，着重论述了国家对于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促进国家消亡的作用，这一论述构成了《国家与革命》的法治建设方面的内容。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在俄国和在中国，都创造了自己的实践经验。

就中国而言，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中国处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为着解

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而接受了《国家与革命》，于是，他们把《国家与革命》当作革命的书来读，并不论及其中的法治建设方面的内容。这显然只涉及了《国家与革命》中的一个方面的内容，是对《国家与革命》的片面理解，但这种片面的理解符合了当时革命的需要，所以，并没有影响这本书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相对和平发展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政治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本应根据形式的变化去更新《国家与革命》的研究，努力发掘其中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思想，使这本书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思想资源，但是，当时我国学界采取了相反的做法，即放弃了对《国家与革命》

“阿芙乐尔”号
巡洋舰的纪念碑。





巨星陨落，事业长存。克里姆林宫前的列宁墓。

的继续研究，转而研究列宁晚年的“政治遗嘱”。本来，在列宁那里，《国家与革命》与晚年的“政治遗嘱”是一体的，但是，学界却把它们彼此分离开来，孤立地研究其中的一个，比如，在研究《国家与革命》时，不连接晚年的“政治遗嘱”，而研究晚年的“政治遗嘱”时，又抛弃了《国家与革命》。这种研究方式给人一种认识上的假象，似乎列宁晚年的“政治遗嘱”与《国家与革命》在理论上是断裂的，《国家与革命》论述的是革命的理论，只适合于革命的时代，而“政治遗嘱”论述的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因而适合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尤其是适合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